

# 中国海商心路历程的缩影

## ——读《透视中国东南》断想

蒋朝君

《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于2003年9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陈支平、詹石窗二位教授主编，其主要撰稿人都是在东南文化研究各个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作为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该课题得到了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该书从十四个方面系统探讨东南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和整合关系，分上下卷，共计140余万字，可谓鸿篇巨著。笔者在这里无意对该书作面面俱到的评价，而仅就其中由陈支平教授撰写的“海商贸易：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阴阳错综”部分作简要评述。

笔者之所以对此编饶有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所作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区分所使然。这种区分意味着中华文明作为黄色文明的典型，代表着保守、顺从、不思进取、自给自足和随遇而安，而西方文明则属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着进取、敢于冒险、有献身精神、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于是在这一背景下，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我们似乎只能坦然接受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

这一区分是深刻的，在理智上也并非不可接受。然而在情感上却似乎总感到有些别扭，“终究意难平”正是此种心态的写照。这种不平心理在“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之一”这一显见的事实面前就更难平息下来。我们总是在追问，在那么漫长海岸线的某个区域内难道就不曾产生过某种海洋文明或海商精神？再则，把整个中华文明判定为黄色文明也绝非无可质疑：它终究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华文明所作的判断。这一判断抹杀了那些具有鲜明区域性特色的文化个体间的差异。于是，我们希望在沿海的某个区域内能寻找到有自己特色的海商精神或文化。于是，这种寻找海商精神的努力化为一个情结，一个期盼中国自己海商精神的情结！

另一方面，笔者的期盼情绪在该书所列举的如下的一组数据面前益发浓烈乃至兴奋：

世界华人富豪绝大部分来自闽、粤、台这三个地域相近和文化传统相似的中国省份，中国东南省籍的华侨华人控制了世界华侨华人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在1995年估计财富为一亿美元以上的386个世界华人富豪中，闽籍华人富豪占世界华人富豪总数的24.8%和总财富的33.8%，粤籍华人富豪占世界华人富豪总数的32.3%和总财富的40.9%，若将台湾地区富豪和台籍华侨华人富豪包含在内，则籍贯为闽、粤、台三地的华人富豪占了世界华人富豪总数约80%和总财富约90%。（第1431页）

我总是在想，那些曾生长于东南这块土地上的富商们成功的背后难道没有某种与农耕文明不同的文明在支撑着？那些自上古以来就持续不断地开展海上贸易并远涉重洋、移民海外的先民们身上流着的血脉难道可以用保守、顺从和不思进取来解释？

这样的情结和疑惑促使我异常关注陈先生该书中有关海商文化的研究。东南地区是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东南地区海商的心路历程正是中国海商们心路历程的缩影！陈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还引导我们去反省中国海商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优缺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海商文化的大门。

陈先生分三部分展开对东南海洋文化的论述。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东南海商形成的人文地理与经济政治条件。陈先生指出东南海商的形成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还有其它原因。这首先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古越人的生产、生活的方式上。与中原的农耕文明不同，古越人依山傍水，以渔猎为主，善于用舟，习于水斗。与这一生活方式相适应，这一地区的造船业自秦汉以来就负有盛名。

【作者简介】蒋朝君，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在与中原文化不断抗争的过程中，也使当地居民形成了比较能适应陌生恶劣环境、勇于冒险和不断迁徙的移民性格。这种勇于冒险和迁徙的移民性格与中原北方居民那种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性格显然不同。这在十六世纪时东南地区海上贸易商人与受到本国政府支持的西方殖民者东进所进行的海上贸易争夺战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陈先生还指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商帮是在明代形成的。在明代，东南的海商贸易不再是一种搜猎海外珍奇和夸示异邦的行为，而是完全与民间的民生经济生活融合在一起，这时才算是一种较具有社会意义的商品经济，海商们才以私人自主商人的特有面目出现。

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东南海商的发展历程。大致说来，东南海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汉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时期。明清两代，东南海商贸易日益发展强盛。明清两代都曾施行过严厉的海禁政策，但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海禁政策有所放宽，东南海商正是在这些海禁放宽的时段内来谋求其发展壮大机会的。“终明之世，中国的海商，当然主要指的是东南海商，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之牛耳，这种局面的形成，它充分说明当时东南沿海人民经商之众多，分布范围之广泛，经济实力和武装实力之雄厚”（第402页）。近代以来是东南海商的变迁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指的是东南地区海商们由自主经营海商贸易转而依附或受雇于外国资本，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买办商人。他们面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激变，比较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迅速转变经营范围，改变传统的从商之道，从而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陈先生在第三部分对东南海商的构成、性格特征、经营方式、最终的归宿及东南海商文化的优缺点、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精彩的分析与归纳。第一，从东南海商的组成来看，明清海商是一个由多阶层组成的群体，无论是贫民、官绅、游棍还是世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极具冒险性的海商贸易之中。第二，是乡族势力与商人集团的结合。东南地区民间社会的乡族组织十分严密，乡族势力十分强大。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乡族势力反映在商业组织中体现为帮派组织、家族组织、族商、族工、族贾甚至族盗。这种乡族势力曾经在明清时的海上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不过，乡族观念表现出排它性色彩，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则成一个致命的弱点。第三，东南海商在经营观念上表现出亦商亦盗的犯禁式特征。他们可能是商人，又可能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不过，陈先生从总体上讲还是对东南海商此种精神文化性格予以肯定：“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政府缺乏世界格局概念而沾沾自喜于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里，东南海商

的这种勇于犯禁冒险开拓进取的人文性格，还是值得肯定。这种勇于犯禁的性格，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便会重新爆发出它的奇异光芒。东南海商在近现代的部分转型以及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活动的率先活跃繁荣，都充分说明了这种人文性格和地域传统的可贵之处。”（第444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华人华侨富豪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精神文化性格的影子。第四，内外联结与山海兼顾。第五，是海上贸易与移民海外相互促进。一方面，东南地区人多地少，即使那些在海商贸易中发财的商人也无法在故乡大置田产，过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明清两代不仅对贩海者不予支持，反而视之为叛逆，对他们多方刁难，使其过着近乎亡命者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移民海外，谋求在海外的的发展，以寻找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最后，是东南海商亦梦亦幻般的归宿。笔者在前边提到，海商们与乡族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地缘、血缘色彩。这由此也形成了海商集团内部组织的严密性和海商集团之间互相排斥、组织松散性之间的强烈反差。这一弱点导致了他们注定不能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阶层，无法取得政治上的地位，无法在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反观同时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海商阶层，他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行会制度，提倡自由竞争，有效地增强了本阶层的凝聚力。为了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各行各业团结起来，与封建领主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就此一点而论，则不能不对东南海商表示深深的遗憾。

东南海商身上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明显的弱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他们的生意越是成功，就越是盼望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海商们多把既为富翁，又为官绅作为他们的理想归宿。然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对海商文化是排斥、不予认同的，故而海商们每每被视为为富不仁、品行卑劣的人。于是，海商们面临着如下几种选择：要么奋起反抗主流的意识形态，争取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性，但因为东南海商自身的弱点，此路不通；要么屈服于主流文化，这是大多数海商们所选择的道路，但是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才能被吸收到王朝的政权中来，并且很少有人能施展其才华，通常只是一种点缀或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移民海外，或许这是他们比较理想的归宿。在那片还没被完全开发、带着蛮荒、散发出原始生命活力的土地上，他们或许能找到他们的乐园、他们梦中的归宿。不过也不尽然，他们骨子里面流着儒家精神的血液，使他们常常面向所由之而来的家乡翘首思念——脸上写满浓浓的乡愁……

（责任编辑 中哲）